

中国近代文学丛书

李昌集 选注

柳亞子詩文選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文学丛书

顾 问

施蛰存 陈旭麓

柳亞子詩文選

李昌集 选注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第201号

柳亚子诗文选

李昌集选注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8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一分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220 千字

1995年4月第一版

1995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本

ISBN 7-5617-1270-1/I·116 定 价: 8.20 元

总 序

近代中国处于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是社会的转形期，与时代、社会息息相关的文学也处在由旧形态向新形态转化的过程中。但我国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研究，相对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来说，一向比较薄弱，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上形成一个低谷。这可能是由于长期兴盛的古典文学到了近代已趋衰微。适应时代生活要求的新文学又还未能脱颖而出，以其无可观而遂被忽视了。其实就事物的“变”与“常”的关系来说，转形期的近代文学比常态的持久的古典文学更需要研究。近年来这种情况已有改变，有的大学已经开设了中国近代文学专业课，好些出版社相继出版了一些近代文学资料和论著的专辑，报刊上探讨近代文学的文章也较多了。为迎接这个已经躁动的研究势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特以作家作品为主，编选出版《中国近代文学丛书》，分别介绍各派各家及其代表作品，使读者对近代文学作品的概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也为进一步研究近代文学提供了不少方便，这对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和近代文化思潮都是极有意义的事。

在中国历史上，完整的近代概念，虽然是起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迄于 1949 年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但是，这套丛书编选的作家和作品，仍以习称的“五四”前八十年的近代为范围，这也因为中国文学发展的轨迹至“五四”才发生哲学概念上的

质变，才由古典文学正式跨进现代新文学的行列，它的这个变化所呈现的阶段性的，比“五四”时期别的领域更显著。然而它不是拔地突起的孤峰，乃是由岗峦起伏的山脉逶迤驰来，我们考察一下“五四”前文化领域发生的变嬗，即可看出由岗峦到高峰的脉络。

一、鸦片战争后的四十年，中国对科学技术已有明显的追求，对政治、教育也渐有新的憧憬，而文学这个领域却很少触动，仍是汉魏章赋、唐宋诗文。作为古代文学殿军、近代文学起头的龚自珍，除了批判的现实主义精神影响后人外，从他那里还嗅不出什么时代气息。随后出现的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王韬《弢园文录》一类书，其中虽不乏文字优美的篇章，但并没有超越《论衡》、《潜书》那种论著的格局。惟有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的眼界已朦胧初开，世界景物、海外风云已星星点点地洒落在他们的笔下；他们也发出了为文“称心而言，不必有义法”（冯桂芬语）的呼声，或“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王韬语）

二、到甲午战争前后的岁月里，经历西学的传播和战争的惨败，迫使人们做出较大的反应。一批慷慨谈天下事的知识分子，开始警悟到士人徒以诗文鸣高无补于亟变的世务，无补于民族的危安，对之渐作贬斥了。康有为说“士知文而不通中外”，徒然“苟且粉饰”；严复说应“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谭嗣同更在其诗集自叙中说：“天发杀机，龙蛇起陆，犹不自惩，而为此无用之呻吟，抑何靡与？三十年之精力散于考据词章，垂垂尽矣，勉于世，无一当焉。”这是在痛惩科场试文的同时，进而对徒作“无用之呻吟”的古典诗文的反省，是推动文学改革的信号。由此恣肆通畅的报刊文章通行起来，

改良诗学的“诗界革命”也登场了，出现了一批在政治上要求改革、在文学上有所创新的士人。康有为是个头儿，而“笔锋所至不受检束”的梁启超时务文，“足遍五洲多异想”的黄遵宪爱国史诗，则最富代表性。他们虽然仍未脱古文古诗的窠臼，但俚言译语，中西人物，古今思想，信手拈来，皆入诗文，在旧的形式中装进了新的词汇与内容，正如前此龚自珍所说：“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水何拒之哉！”这就造成了一代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过渡形态文学，即日后盛称的“旧瓶装新酒”。那时饱受西方教育的严复，他译述《天演论》等书，也还是要把西方的新意境纳入汉魏文章的旧风格中，让人能像诵读汉魏文章那样去诵读。

三、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初年，知识界的视野扩大了，新意境增多了，继“诗界革命”之后，而有“戏剧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它们已不止是旧风格含新意的延伸，而是新意境已在冲击旧风格的墙壁，大量报刊和译著日益发生这种作用，其中又以对小说、戏剧的新认识和发行白话报更具有这种势头，一向被鄙视的小说，在正宗文学里没有它的地位，自1897年天津《国闻报》发表《本报附印说部缘起》，特别是1902年梁启超创刊《新小说》杂志并刊出他的《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指出小说对政治、社会的重大作用，小说开始同正宗文学的散文、诗词并称了。尽管当时流行的谴责小说及其他社会小说没有突破旧的章回体，但所涉及的内容和描述的手法，无疑受到了西方文艺的影响，以至引起小说价值观的变化，及旧风格的动摇。戏剧方面，不仅以旧形式演时事新戏，而且出现了与旧形式完全不同的新品种——话剧。为了开民智，为了宣传革新，自1897年裘廷梁发出了“白话为维新之本”的呼声之后。1901年《杭州白话报》、《苏州白话报》、《京话报》问世，

相继创刊了十余种白话报，打破了报刊一律文言文的旧形式。这种报刊白话文不是富有审美观的文学语言，但它是现代文学的基石，不久，新文化运动揭出的“文学革命”旗帜，就是以白话文为前导的。

近代文学的短暂历程，是接受西方文学的挑战从中国古典文学的演化过程中推向现代的，其特征是变，新陈代谢的变。1902年，蔡元培选录“当世名士著译之文”，间取“于新意无忤”的先哲遗作，辑为一书，题名《文变》。他在序言中说：“自唐以来，有所谓古文专集，繁矣，拔其尤而为纂录，评选之本亦不鲜。自今观之。其所谓体格，所谓义法，纠缠束缚，徒便摹拟，而不适于发挥新思想之用。”可见他的这个选本，不是《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抄》的续编，乃是《诗经》、《左传》两千数百年以来的“文变”。

“文变”，变了什么？旧风格含新意境是它的主要变征。新意境是随同外境的变迁而来。受现实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引导，以新词新义反映民主进步意识，有的来自外国资本主义的译作，有的是直接观察所得，由此对残暴、欺诈、腐败、愚昧种种社会现象的揭露，除了那些以讽刺谴责著称的小说和龚自珍、金和等人的诗文外，其他千百种近代人的诗文集和杂著都不无这样的篇什。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大量爱国作品，从张维屏的《三元里》数起，有许多是既富民族激情也很有时代色彩的杰作。新意境的积累不会只满足于旧风格的容纳，势必触动旧风格，梁启超的不受绳墨的新文体，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的创格体，王国维在文艺理论方面的意境、境界说，海派文化带来的艺术新风，不能说不是随着新意境在风格上产生的微变。

这种变嬗中的近代文学，可以从中看到新时代的步伐，是

近代文学的主流。梁启超曾说那个时候，他们“冥思苦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当然在文学上也逃不出这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状态，就时代的跨度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古不今、即古即今”的文学，所以我喜欢用“学问不中不西、文章半今半古”来概括他们的风貌，这似乎是从龙钟的古典文学进到活泼的现代文学的必经阶梯。“不中不西”、“半今半古”是就“文变”的迹象而言，必然还有不变者存在，那就是固守樊篱的古文派，他们既有在嘉庆时已中衰，经梅伯言、曾国藩的提倡，自道光后又振兴的桐城派，而曾国藩为文主气势，得友徒的烘托，更被称为入乎桐城又出乎桐城的湘乡派；也有由祁寯藻、程恩泽等对宋诗的推崇，进而衍为陈三立、陈衍、郑孝胥一派入宗宋诗的同光体；还有言必称汉魏的王闿运，所作湘绮楼诗文皆古色斑斓，这些文派、诗派，或拘守性理义法，或生涩模仿，已背离时代，近于僵化，但也不能一笔抹煞，他们席古典文学的余荫，运用成熟的技巧，不是完全没有锤炼出可取的作品来，因为艺术作品的产生与欣赏常会超越时代而存在。

在新文体与古文学的角逐中，反映了新旧两种观念在文学上的差异，但它们并不等同于政治上的新旧进退。如早年即立志革命又能博采西学的章太炎，他以渊博的学问，条达的理论，发而为凝炼精深的文章，即其论学著作有的也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应该说是近代的古典文学巨匠，他却认为文章“有其利而无其病者，莫如魏晋”（《国故论衡》）；刻意摹拟魏晋，采辟词，用古字，成为他的癖好，终因远离生活，他的学问大有传人，而其文章已无嗣响。又如南社是著名的民族革命文学组织，成员大多兼有同盟会会籍，宣传反清，宣传民主，影响遍及东南各省，而其文学实践却是比较保守的。展视二十二集《南

社丛刊》所录诗词和散文，虽不乏佳作，但对艺术的创新，找不到黄遵宪那样的诗人。也没有梁启超那样的笔锋。作为南社巨子的柳亚子，无疑是一个积极的革命家，他留下了七八千首古体诗词，是一位很有影响的诗人，但从风格上说，并没有太多的创新和突破。

“五四”新文化运动结束了近代文学的历程，它是以“文学革命”为号角的，对先前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革命”、“文界革命”和白话报的局部改良是个伟大发展：一、宣布一切文言文是死文学，白话文学是活文学，要求从文学的基石——语言文字开始的全变革，造成国语的文学；二、摒弃一切脱离生活的古典文学，提倡国民的写实的文学。新文学代替旧文学成为总的趋势，在“五四”前夕 1917、1918 年已展示出来，从此进入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时代。近代的“文变”则是进入这个时代的引桥。我们编辑这套丛书，也是企望它能成为研究近代文学和认识近代社会的引桥。

陈旭麓

1987 年 6 月于华东师范大学

“誓凭热血三千丈，遍染中原赤帜妍”

(代 前 言)

柳亚子，原名慰高，号安如。后更名亚卢（一作亚庐），再更名弃疾，号亚子。后以亚子为常用名号。

清光绪十三年（1887），亚子出生在江苏吴县北库镇大胜村（后迁居黎里镇）的一家书香门第，3岁时识字，8岁时开始读杜甫全集，后历涉经、史、子、集。14岁时，亚子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一些小诗，以后屡有诗文问世，为当时文坛所瞩目。1909年，23岁的柳亚子与陈巢南等发起组织南社，并担任实际组织工作，成为南社的主要主持人。南社是晚清到民国初年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个文学团体，当时全国的文坛精英和革命志士几乎都荟萃在南社之中，他们以反清光复为标帜，反对专制，呼吁民权，成为当时文坛反对清王朝的主要阵营，亚子则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同时，亚子又是孙中山组织的中国同盟会会员，他以文学为武器投入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在辛亥革命前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风云变幻中，亚子顺应历史潮流，成为人所敬佩的民主主义革命战士和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详见本书《柳亚子年表》）。

柳亚子是诗人，他在我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之不可磨灭，

更主要地在于他的文学成就。他的文学创作和时代脉搏紧紧相连，尤其是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这一历史时期，在诗文中如此全面反映了历史风云的，亚子堪为文坛翘楚。所以，茅盾先生盛称亚子为“诗史”。

确实，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其间若干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亚子诗文中几乎都有反映——西方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输入、康有为等的“纪孔保皇”、徐锡麟和秋瑾的武装起义、同盟会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南北议和”与“筹安会”、袁氏称帝、护法运动、军阀间的混战、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直到苏俄无产阶级革命震动中国，中国找到了自身解放道路……从亚子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现代交错时期艰难而蹒跚的足迹；看到中国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历史变革中的剧烈阵痛；看到古老的中国“睡狮”怎样奋起。正因如此，亚子才获得“诗史”的称号。

亚子“诗史”的更深涵意是他的文学创作反映了一个处在巨大的新旧历史交替中知识分子的心灵，由此可窥见中国近、现代接受了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以及他们的普遍心态；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现实、中国命运的思考；反映了他们面对光怪陆离的现实所产生的痛苦和迷惘；反映了他们和浸染甚深的传统文化分离的决心和矛盾。这正是亚子“诗史”更深刻的意义所在。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洋枪洋炮打碎了中国人“四海之尊”的幻觉，中国这才意识到要向西方学习。自然，以仇者为师，不免痛苦、矛盾，但却是清醒的表现。然而，“祖宗之制”延绵已久，一朝何能痛痛快快割舍？于是，便出现了拖辫子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立宪之议”。三者的本质不尽相同，但都没有脱开“改良”的窠臼，而其间的深化线索却又明显可

见：从对单纯“国力”的考虑渐进到对政体本身的反思。“洋务运动”以甲午战败而破产，“戊戌变法”在慈禧的屠刀下被扼杀，有识之士深切感到“改良”不是中国的出路，彻底推翻中国现存政体才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一批爱国的南洋华侨——他们没有辫子，接受了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举起了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战旗。当然，直接的对手是凶恶的清廷，而与“立宪”改良派的对垒也十分严峻。尽管立宪派并非“愿我大清万寿无疆”，立宪运动领袖梁启超幻想“立宪”可以使汉人通过“政治能力”的“优势”，从而取代清人的统治。姑不论这种幻想多么幼稚天真，“君主立宪”的实际效用却成了清廷延续其腐朽统治和愚弄国人的幻术。清政府下“立宪”之诏，装模作样地改革官制便是证明。“君主立宪”成了革命的绊脚石，揭露“立宪”的迷幻和虚伪便成了当时思想斗争的焦点。柳亚子《中国立宪问题》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此文对中国从戊戌变法以来改良道路的深思，对“立宪”本质的清醒认识和尖锐批判，体现了先进知识分子已彻底摒弃了改良之路。专制不除，立宪何易？民智不开，立宪何成？这是亚子思想中最为深刻的两点。当然，文中最醒目的是一种推翻满清统治的战斗呼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种热忱而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应当看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借传统的“华夷之辨”以宣传革命，使国人易于接受，其实质则不仅是推翻清王朝，意义更在推翻延绵几千年的封建政体。如果单以爱国主义去理解和评价，不仅不够准确，也不能包括它的全部内涵。亚子敏锐地提出“民智”问题，¹⁴正是意识到长期封建文化中的毒素对人民的侵害，晚清政府不过是丧失了封建社会的一切活力，却聚拢了一切封建脓血的毒瘤而已。因此，亚子强烈的反满精神就不是偏狭的大汉族主义。亚子一

方面以中华民族传统的反异族侵略精神呐喊推翻腐朽的清朝统治；一方面又深刻地从启发民智的角度，对整个封建文化传统予以反思和批判，二者构成互为表里的两面。而这正是亚子诗文的两根思想主线。

围绕着这两根主线，以辛亥革命为分界是亚子文学创作的第一个时期。亚子的诗文洋溢着一种战斗情绪：抨击清廷，呼喊革命，赞颂志士的热血，以及诗人参加战斗的渴望，交织成一种慷慨激昂的主旋律。而对封建思想的抨击和批判则是这一主旋律的和声。亚子对封建传统批判的核心是对人权的追求。“上言专制酷，罗网重重强。人权既蹂躏，天演终沦亡。众生尚酣睡，民气苦不扬。”（《放歌》）在对人权的追求中，亚子呼喊最多而最具体的是男女平权。“女权痛零落，女界遭厄殃”（《放歌》），“平等楼台春浩荡，共和眷属月婵娟”（《贺高卓庵结婚》）。亚子为不少女性作传，在《冯茜华传》中，他赞颂了一个女中学生敢于追求自己人生道路的新女性精神。如果说在《放歌》中，“人权”和“民智”还表现为一种逻辑的关系——专制造成了人权的丧失，人权丧失则又造成民智不开；在《冯茜华传》中，亚子则用一实例证明：民智一开，人们则必然反对专制，追求自由。男女平权、女性解放乃是亚子呼吁人权现实的具体化，“众生尚酣睡，民气苦不扬”才是亚子的深层意向所在。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民权”、“民智”在亚子此期诗文中还显得较抽象，它还缺乏深刻而更为切实的内容。对混沌“民智”的痛苦和焦虑是近现代进步知识分子热爱祖国和人民的一种深沉表现，但也显出他们与民众的隔膜和距离。亚子此时也未意识到，人权的建立、民智的开放，并不是推翻一个满清王朝便能一蹴而就。亚子对现实、对封建中国更深沉的思考还有待于将来。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被推翻。次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革命可谓胜利了。然而紧接着的是昔日清廷的干将袁世凯在北京组织政府与南京对峙，南北议和声起。亚子竭力排击议和，撰文痛骂袁世凯，攻击南京政府主和派，但“搅了一个月左右，终于文字无灵，南北统一”（柳亚子《南社纪略》）。孙中山逊位，袁世凯就任总统。接着便是筹安会的无耻表演和袁氏称帝、张勋的短命复辟和段其瑞乘机渔利、军阀间的混战等一连串的闹剧和丑剧。历史虽已不可能退回原位，但国民党声势不振，许多革命志士，如周实丹、阮梦桃、宋渔父等老同盟会员、南社社友，革命时未遭清廷杀戮，“革命成功”后却死于清廷遗孽和新军阀屠刀暗枪之下。在风云动荡中，南社内部亦产生分化。充当政客者有之，热心“国粹”者有之，消极遁世者有之，矛盾迭起，社务不振。1918年，亚子辞南社主任职，至1923年新南社成立，亚子不复参加南社活动，南社实际上解体。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是为亚子文学创作的第二时期。亚子经过革命成功的短暂喜悦，随即却遭到理想破灭的更大痛苦。而这痛苦较辛亥革命前的痛苦更加深沉，因为这是梦寐以求的理想一旦破灭而找不到出路的大悲伤。

如果说亚子以前的诗文大部分充满着一种为坚定信念支持着的兴奋和慷慨的话，这一时期的亚子诗则更多地回旋着一种孤独感和失落感。“夙有澄清志，而今事总非，”“去住浑难定，浮沉只自嗟。寒宵不成梦，诗思乱如麻”。（《岁暮杂感》）这便是亚子当时心境的写照。亚子诗平添了一股苍凉之气，透露出“英雄末路的感慨”（柳亚子《我和言论界的因缘关系》）。“何当偕隐桃源住，读画吟诗忘永夕。”（《红梨赠谭天风丈》）一种对现实的失望感深深吞噬着亚子的心。传统的遁隐逃世之

想不时出现在诗中。这里，我们似乎又看到了传统文人的影子。然而，软弱退却不是亚子的性格，亚子也不是封建时代的旧文人。“逃世岂真甘寂寞，佯狂聊以慰妻儿。嵇生柳下曾无锻，杨恽南山尚有诗。”（《少年一首》）亚子并没有真的到虚幻的“桃花源”中去找慰藉，而是更冷峻地立足人间审视现实。亚子并没有被失落感压垮，而是默默地、顽强地寻找新的起点。亚子更深沉了。亚子不再像前期那样对民权作热情然不免有些空洞的追求，他用他的笔抨击混乱而黑暗的军阀统治，揭露辛亥前后的中国在实质上并未根本改变，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虽然这种意识还很朦胧，但却是亚子思想历程中新的起点。亚子对“民智”也不再像前期那样作诚恳然而不免有些清高的呼喊，而更多的是对自身的反省。他常常责备自己的书生气，喟叹自己的软弱。这里有他对不能亲身参加血的战斗的遗憾，更深层的意味则是体现了一个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却又不能扎根于中国现实的近代知识分子一时找不到出路的悲哀，然而这恰恰又标志着一种新觉醒的开始。亚子常痛苦于缺少知音，从而更加执着地追求着新的同志和伙伴。这种心态正是中国近、现代交错时期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普遍心态的反映。孤独、迷惘会毁灭一个人，同时也会造就一个新的人。正是在对现实深沉的思索和对自身的反省中，亚子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信仰，确立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1922年，亚子自云“醉心于马克思之学说，布尔萨维克之主义”（《〈吴根越角集〉后序》）。“率土自应尊国父，斯人不出奈苍生”，“白宫北美推华盛，赤帜西俄拥列宁”（《五月五日纪事》），“誓凭热血三千丈，遍染中原赤帜妍”（《三十有一日……书示儿子无忌》）。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亚子诗中的豪健之风。从此，亚子的心境又逐渐走向明

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建立这一历史时期中，亚子成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真正的追随者和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这正是中国相当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的道路。从昂扬激愤到徬徨失望；从痛苦的探索到目标明确；这是近现代交错时期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思想历程和心理轨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子才真正堪称“诗史”。

与亚子的人生道路相契合，亚子的文学思想也充满了一种积极入世，干预生活的现实精神。仅从文学观念的角度看，亚子与古代“经世致用”、“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传统一脉相承，这在他给苏曼殊的诗作中体现得十分鲜明（详见《苏曼殊近作，占此报之》、《和苏曼殊本事诗十章》）。在风云动荡的年月，一个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是不会去侈谈“纯文学”的，这是文学思想史上一个通见的现象，亚子的文学观具有一种战斗色彩，恰与其推翻旧中国的信念相契合。在诗论上，亚子反对“同光体”步江西诗派末流后尘的模拟与“枯寂”，对“古色斑烂真意少”嗤之以鼻，对黄遵宪这样颇具新意的诗人，亚子也以其缺少战斗气息而不无遗憾（详见《论诗六绝句》）。在词论上，亚子盛赞辛弃疾，对晚清到民国崇尚姜夔、吴文英一路不以为然，其出发点也在此。今天看来，亚子的这些看法未必都公允，但就其在特定历史环境中观照，亚子之论在当时确有振聋发聩之效，无怪乎当时“见者惊为狂生”（柳亚子《自撰年谱》）。

亚子对俗文学也十分重视，他曾是晚清戏剧革命的倡导人之一。其中，亚子表述的俗文学与开启“民智”的关系尤堪注意。《〈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稗海〉序》是其代表作。在这两篇文章中，亚子提出通俗文学较正统文学对一般民众更具“感化”之功，“影响捷矣”之效，而通俗文学的品质高下并

不在其文体为何，却在“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对通俗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本质所在可谓洞察分明。这使我们想起明代冯梦龙等对通俗文学所作的类似评价，其间又可窥见亚子文学思想与传统的深厚联系，只是亚子的“感化”、“影响”具有更切实的时代针对性，而不仅仅是一般的理论观念。当然，亚子的文学思想缺少一种理论化的色彩，更谈不上什么体系，不妨说它只是亚子政治思想在文学思想中的折射。而这恰又是亚子的一大特色，他极少作抽象的理论思索，而是更加直捷地将他的笔、他的情感、他的思考投入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惟其如此，亚子文论虽不多，却足以振撼当时逍遥于局外的迂腐之辈，在精神上和方向上给进步的文坛以生气和影响，从而与其文学创作相映生辉。

亚子文学成就主要在他的创作。其总体面貌是在浸润了丰厚的古典文学传统基础上形成的。就此而论，亚子文学不属于现代文学范畴，而是近代文学的殿军，在某种意义上又不妨看作古典文学的终结。

亚子文学创作的体裁丰富，策论、传记、骈文、散文、诗、词、曲，均有涉猎。其策论笔锋犀利，逻辑严谨，精论博证；其散文气势浩然，颇有荀、孟和昌黎的流风遗韵；其传记则简炼中寓以丰润，往往一、二点睛之笔和细节之勾勒，人物性格和内在精神肖然毕出，末又常以太史公笔法总赅要旨大义，使全文事、情、理交合互生。在当时，亚子的传记文是颇有声誉的。亚子的骈文做得也很出色（亚子曾被南京总统府特聘为写骈文的秘书，后因无事可干，加以身体不佳，仅三天便辞职），并敢于突破藩篱，骈散结合，我们从《神交社雅集图记》中可略约窥见一斑。

亚子最为著称的是他的诗歌。时代的风云、爱国的热忱、